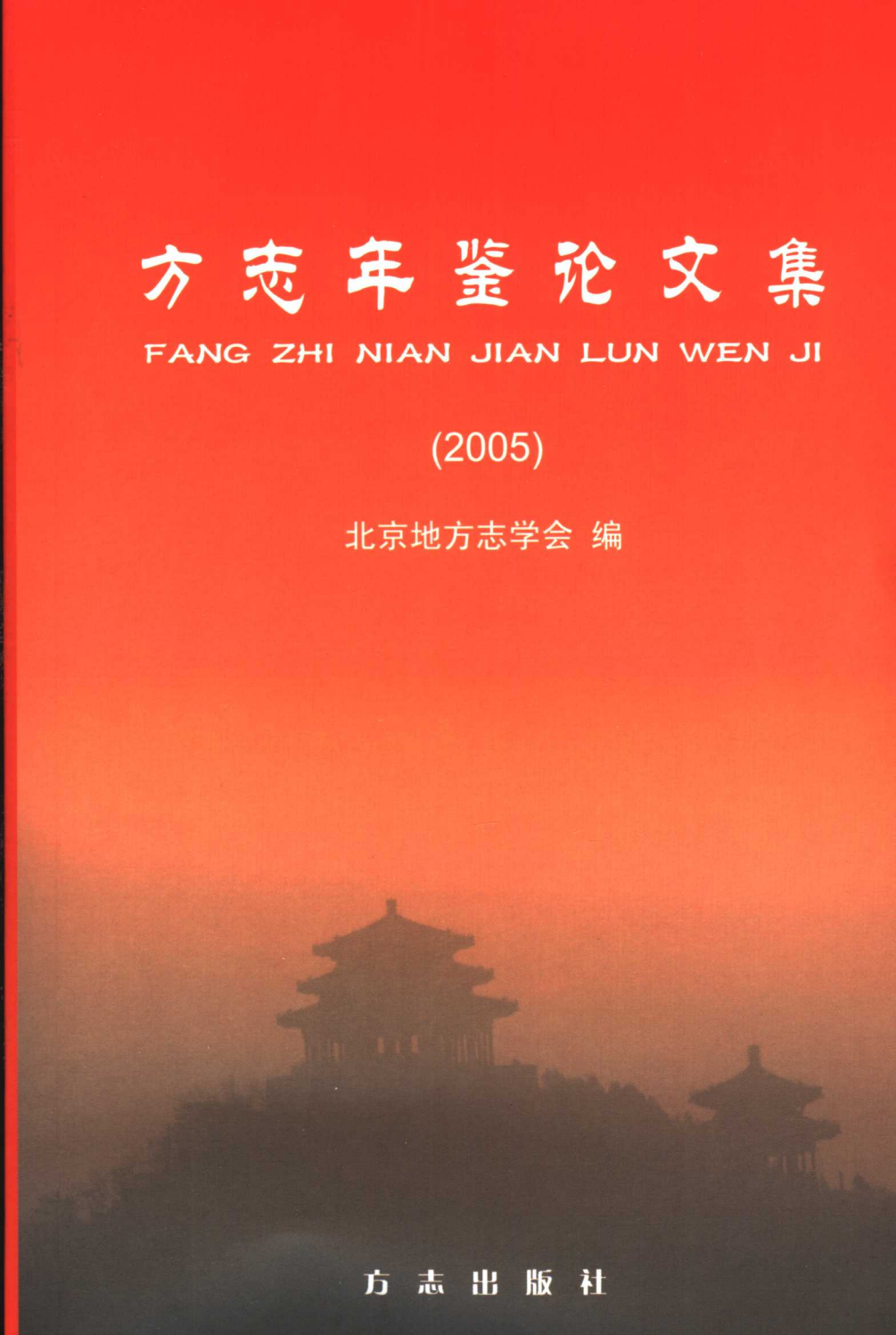


方志年鉴论文集

FANG ZHI NIAN JIAN LUN WEN JI

(2005)

北京地方志学会 编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gradient of orange and red,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In the lower half, there is a dark silhouet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cluding a large, multi-tiered pavilion with a curved roof and a smaller structure to its right.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historical.

方志出版社

方志年鉴论文集

(2005)

主	编	王	春	柱
执行主	编	田	颖	男
副主	编	刘	孝	存
		朱		民
编	辑	杨		超
		滕	质	庆

方志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方志年鉴论文集. 2005/北京地方志学会编.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192-729-X

I. 方... II. 北... III. 方志学—文集 IV. K2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299 号

方志年鉴论文集(2005)

编 者: 北京地方志学会

责任编辑: 陈 颖

出 版 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部

(010)85195814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法律顾问: 北京市京诚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ISBN 7-80192-729-X/K · 539

定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秦其明

这是北京地方志学会编辑出版的《方志年鉴论文集》。作为学会活动的成果，这已是北京地方志学会结集出版的第三本论文集，可见活动开展得颇有成效。

我到方志系统工作几年来，深切感受到这个系统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群众性的理论研究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方志系统的工作者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方志业务工作的理论研讨有很高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在做好实际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有关的理论研讨活动。其参与的广泛程度和热烈程度，在其他实际工作系统或部门是不多见的。方志工作本身并不是一项理论研究工作，但是却又离不开方志理论研究。方志和年鉴的编修，需要方志理论的指导和支持；而方志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需要通过对方志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方志工作者广泛参与方志理论的研讨，无疑对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是双促进。

在方志系统，群众性的方志理论研讨活动

的主要组织依托，便是方志系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地方志学会（部分地区叫史志学会）。各地的方志学会，每年都会组织一些学术活动。尽管这些活动规模不等、内容各异，然而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群众性和民主性的特点。一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方志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围绕方志机构修志编鉴的工作开展。实际工作中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学会进行理论研讨的课题，真正体现出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远离实践的纯理论、纯学术探讨，在这里是极少的。二是实际工作者的参与度高。这些方志理论研讨活动的参加者，除了极个别的是专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外，余下的可以说都是方志工作者。他们才是这些学术活动的主体。三是较好地贯彻了双百方针。在研讨活动中，参加者完全能够畅所欲言，领导者也只是会议参加者的一员，互相可以平等地探讨、交流，不存在“一言堂”的情况；讨论中发生争论、交锋是常有的，但也没有听说出现互相攻讦、“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学术民主空气很浓。伴随着方志工作的进展，在方志系统，方志理论研讨活动一直呈现着参与者众多、论文著作丰硕的繁荣景象。当然，在一些活动中也还存在诸如规模过于大型化、形式比较单一、议题不够集中、理论探讨尚欠深入等缺点和不足，不过，那是属于需要另文探讨改进的问题，此处无需赘述。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虽然我没有参加北京地方志学会的年会，但从年会的成果——这

本论文集中，依然可以看出上面所说方志系统开展理论研讨活动所具有的“三性”特点。论文集中的论文尽管议题广泛，但都是方志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论述紧密结合实际，很少进行抽象的学术思维和纯理论的阐释，使人尤其是从事方志实际工作的人看起来明白易懂；论文作者是来自于市区县各级方志机构和一些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有领导同志，也有一般干部；有负责志鉴编纂的主编、总纂，也有一般的编辑。人数虽不多（与入选的论文数量有关），但代表的面却很广泛；集中论文虽则因议题不同基本是各说各话，很少有交集但文章观点鲜明，行文开门见山、朴实明快，没有拐弯抹角、云遮雾罩，没有所谓的“曲笔”。这不仅是文字风格问题，也反映出作者不存避讳、心无顾忌，使我们体察到理论研讨会上宽松的学术氛围。

读这本《方志年鉴论文集》，如同读到方志系统已经出版的许多论文集一样，令我们感到欣喜和振奋。正因为这些论文植根于实践、植根于群众、植根于民主的丰厚肥沃的土壤，它们才能保持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从而使方志理论之林蓊郁长青，并指导和推动修志编鉴工作不断迈向新境。

2006 年春节

目 录

序	秦其明(1)
---------	----------

方志论文

讲政治与讲真实	段柄仁(3)
2005:地方志工作关键之年	王铁鹏(10)
部分省市《政府志》简析	张士平(14)
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陆 奇(30)
志书评鉴标准探论	张东升(37)
深悉历史 彰显因果	
——评《北京志·工人组织志》概述	郝玉梅(60)
说“篇目”	王化宁(64)
浅谈对第二轮修志的资料认识	田颖男(68)
修好志应做到“三个三”	丁 毅(81)
试论首都园林行业修志特色	强 健(86)
修志中运用数据的几点思考	黄正明(95)
编志琐谈	
——编《北京志·统计志》有感	杨乃超(101)

认真搞好《统计志》资料归档工作	陈志民 张庆敏(115)
浅议军事志续修中的两个问题	李建军 纪红建(119)
突出区情特色 增强志书可读性	侯 玺(130)
记述全区、突出特色	
——论新一轮城市区志的工作机制和记述原则	王宋文(138)
地方志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陈 魁(148)
求问题之真 务解决之实	周方彤(154)
试谈城市区志入传人物的选择与撰写	杨博贤(159)
第二轮修志中实施精品战略的几点思考	丁文礼(165)
我的修志点滴	卢瑞恩(171)
主编学习刍议	卢广煜(178)
浅谈修志工作管理	李桂清(184)
浅谈运用系统论指导第二轮区志的编纂工作	刘文江(190)
《通县志》编修工作的反思	张洪林 孙连庆(197)
关于志书整体性的几点认识	李 云(202)
读志用志 彰往昭来	陈仲华 王亚琴(211)

年鉴论文

我国早期的年鉴	运子微(219)
如何提高年鉴数据的使用价值	廖丽玲(226)
浅谈《北京年鉴》的框架设置	杨 超(230)
关于年鉴数据的几点思考	杨 超(237)
论年鉴的实用性和大众性	沈红岩(241)
撰写年鉴“综述”的体会	潘惠楼(245)



方 志 论 文



讲政治与讲真实

段柄仁

内容提要：本文就志书编纂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政治和讲真实的关系，讲了八点认识，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阐述；提出：讲政治和讲真实是相辅相成的，讲真实是基础，讲政治是灵魂。没有真实做基础就谈不上先进政治。没有政治做指导，也难以求真务实。

关键词：地方志 政治 真实 探讨

这次市地方志学会年会上，学会的几位秘书长给大家汇报了去年的工作，提出了今年工作的大体规划，对学会的领导层做了一些补充和调整，请大家讨论批准。同时这个会上，还对如何推进方志工作，进行了探讨。一些同志的发言，多是在多年的实践基础上对编写方志的经验之谈，有的在理论上做了一些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那么，在社会主义方志理论的探索上，我们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处于从工作层次向理论层次过渡的阶段。工作层次主要是回顾过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但在回顾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些对下一步工作有指导意义的新的想法，新的认识，有的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加以探讨。但现在多数还处于工作层次的回顾，这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回顾，没有经验的总结，就没有理论的概括、理论的抽象。回顾是基础，是我们这些年，第一轮方志编纂工作的群体性总结。十多年来，北京市上万人参与了第一轮修志工作，规划172部志书，已出版或终审了130多部，这是北京

市文化基础建设的奠基性成果。此外还有两个成果：带出了一支队伍，总结了一批经验。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才能探索修志的普遍规律，上升到理论层次。刚才昭钺同志和铁鹏同志对今年的学会工作提出“三个跳出来”的指导性意见，概括得非常好。其中一个跳出来就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回顾和总结经验教训上，要从这里面跳出来，上升到理论层次。多探讨一些带有共性的、规律性的、针对性的理论问题，这是点睛之笔，我完全赞同。

借这个机会，我想就志书编纂当中，普遍存在、大家比较苦恼，也绕不过的一个问题，就是讲政治和讲真实的关系，谈点意见，作为探讨，以求引发深入讨论，取得共识。

在我们方志学会编的刚刚出版的《方志年鉴论文集》中，有好几位同志触及了这个问题，其中田耕同志的《志书之魂：真实》一文，对修志必须讲真实的重要性和它的难处，可以说讲得很透了，很有说服力。王军同志的《修志的难点和思考》一文，也把实事求是专列一个问题加以论述，他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修志的重要原则。但是，真正做到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讲真实很不容易，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条件讲，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环境，比较健全完善的法制环境，和谐宽容的思想文化环境，和具有一定支撑力的经济物质环境。其中有些是属于制度性制约。有些则是属于一些人认识不到位，思想偏于守旧，不开放，不解放，或者因利益关系的牵扯，不愿讲真相，写实情。应当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这些方面有了根本性好转，民主、法制、文明、富裕、和谐等都成了我们治国的理念，成为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主要内容。但是，也应看到，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文化和物质条件还不可能那么宽松，特别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制度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某些局部难以求真求实和有意弄虚作假的环境条件。

从主观上讲，讲真实难也和编纂者的思想、品德、文化素质、认知能力等，也就是我们讲的水平和人品问题，有很大关系。在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关系上，就有许多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编纂地方志必须讲政治。这并非因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核心问题，而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统治者没有不提倡讲政治的。是古已有之，中外皆兴。我们的先人修志也是这样做的。不同的是在封建社会，政治的核心是皇权，讲政治就是维护皇权。“文死谏武死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一些史官不惜身家性命而如实记载历史，出发点就是封建统治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志书是意识形态，是精神产品，既为经济基础服务，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讲政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的修志标准把“观点要正确”作为十分重要的一条，因为我们修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就是政治。我们还明确讲，修志要严把政治关，把政治看成是一个“关”，而且是要严把的“关”。政治上出问题，就一票否决，原因也在于此。

第二，编修新方志应讲什么样的政治。讲先进的政治，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民主和科学政治，而不是腐朽没落、专制愚昧的政治。在当代就是无产阶级的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政治，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符合国情的政治。在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政治。这样的政治，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贴标签式的，而是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生产方面尤其要注意，编修新方志也不可能例外。要充分认识并利用先进政治对修志的指导和支撑作用，也要清醒地看到并防止腐朽或先进政治中某些落后成份对修志的制约和误导作用。

第三，对志书的编修，讲政治首要的是讲真实。先进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脱离了真实的政治，是落后的政治，腐朽的政治，甚至是反动的政治。凡是革命的先进的阶级、组织、个人，不仅不怕真实，而且尽力追求真实，把真实性作为它的起点，

作为它的动力，作为它的武器，来向腐朽没落的反动的政治进行斗争。所以真实性是先进政治的基础，是先进政治的武器。我们讲政治，首先是要讲真实，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讲政治，在先进的政治指导下求真实。志书是资料性著述，资料只有真实才有生存价值，不真实的资料是一堆垃圾。地方志记载的各种事实，如果不是真实的而且是虚假的，那么这一部志书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其害无穷。它不仅误导了当代，而且对子孙后代留下祸根。从这点上讲，志书的政治性首先反映在真实性上，求真应当是志书讲政治的本质特点。

第四，讲政治不等于“政治化”。现在社会上的形式主义歪风盛行不衰，在政坛上的“讲话报告穿鞋戴帽”就是一种表现。空洞的议论、标签式表态、矫揉造作的口号充斥某些文件、文章。这种风气也刮进我们志书编修中，好像不喊口号，不发议论就是不讲政治，其实大错特错。讲话报告中陈词滥调让人生厌，志书也跟着学，那就等于抹杀志书作为资料性著述的本质特征。志书是写实，不需要大段大段议论，更忌讳标语口号式结论，它只要如实地记载事实，就基本完成了任务。当然，志书的撰写也不完全排除议论，特别是概述，一般都有不少议论，但它是站在高起点上的，高度概括一部志书的精华，必须有一些概括和导引性议论。在志书的某些环节，也允许有一些结论性的议论，从历史的逻辑性上推导下来的精短的议论，可以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把志书的讲政治看成必须大篇大篇地发议论，大段大段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论述和结论，或者让自己的思想随意驰骋，不断发表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这不仅不是讲政治，实际是对志书特点的背离。志书的政治观点，主要不是体现在议论上，而是反映在资料的搜集、选取和编排上。你取什么，舍什么，哪些选得多，哪些选得少，哪些排在前面，哪些排在后面，都是以一定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为指导的，这是志书的讲政治和非资料书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胡乔木同志 20 年以前就批评过志书的政治化倾向，现在仍未完全解决。

第五，讲政治也不等于只唱赞歌。这是当代人修当代志最易出现的弊病。有人认为，地方志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地方领导集团和

领导人服务，“成绩轰轰烈烈，问题吞吞吐吐，失误遮遮掩掩”。我们有些志书在讲成绩时，不仅是大小不漏，有的还加以包装、渲染、拔高，对问题特别是失误，或者藏而不露，或一笔带过。赞歌是要唱的，但要唱得实在，唱得恰如其分。因为成绩是客观存在，不写够写透，是志书的缺陷。而且成绩也不是哪个人的，是群众创造的，如实记载群众的功勋更是志书的使命。但在唱赞歌的同时，也要写悲剧、写失误。因为历史从来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不存在直线向前。所以只写成绩，不写失误本身就说明这部志书总体上是不全面的，不公正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从修志实践上看，在一定意义上，写历史的曲折比写历史的辉煌更有意义，也更难。所谓有意义，就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是有成本的，成本中很大一块就是失误。换句话说，也只有许多失败做基础，做垫底，才有成功可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对社会发展的真理性概括。不写失败，没有“母”，哪有成功之“子”？当然写失误、失败也是修志的难点之一，难在什么地方？现代人写现代事，脱不开一些与阶级、阶层和个人利益的直接牵扯以及与此有关的偏见。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阶层，都很难直面自己的缺点和失误，一旦如实曝光或追究，有些人就会千方百计地掩盖、曲解甚至阻挠。如果这些人是当权者，必将对修志人员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一点，不少同志是有亲身感受的。

第六，讲政治更不等于唯上、唯书。有人以为讲政治就是一切听顶头上司的，唯领导马首是瞻，领导没有发话就要按上级文件精神或经典著作的内容去写，唯“红头文件”和经典著作之命是从。应当说，领导讲的、文件和经典上写的一般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正确而又适时，就必须照办。但如果不能联系实际，眼睛长在头顶上，只看上，不看下，没有把实际情况和上级指示结合起来，就会背离实事求是的轨迹。还应看到，文件也好，书本也好，领导讲话也好，都是有时效性的。在某一个时期是对的，过一个时期环境条件变了，就难以适用了。何况过去有些文件和领导讲话本身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更不可作为志书的依据。当代人修当代志书，最

忌讳“跟风跑”，上面一有什么“新精神”，下面就“刮风”，就紧跟、照办，这是容易出偏差的。因为领导讲话是有针对性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重点。如果今天强调某方面要反左，你就向右转，明天他又对另一方面强调防右，你又向左转，就乱套了。那不叫讲政治，而叫抛弃政治原则的实用主义，说得尖锐一些，在作风上不是求实，而是投机。

第七，讲真实，并非事事求全。如果要求所用的材料都面面俱到，处处完整，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志书的真实性，首先体现在使用材料的真实性。材料特别是典型的基础性的材料，是真实的，历史上发生过的，不是杜撰的或者错误的记载，志书的真实度就会提高，志书的质量也就有了保障。因为志书质量主要体现在对核心资料的真实展示上，而并不要求面面俱到。有限的文字，不可能容纳无限的事情。修志者必须锻炼披沙拣金的本领，在众多的资料当中去选取能够体现事物本质的发展规律的，舍弃一些次要的，要拣西瓜，舍芝麻。求真的同时要求精，而不是求全。要分清主次、轻重，使其各得其所，不能把小事夸大，大事简化。否则会局部失实，会导致全局失真。

第八，讲真实也不是不讲保密。保密工作慎之又慎，这是从中国共产党搞革命开始就一再强调并十分严格地执行的纪律。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多极化大趋势下，就更应该强调保密的纪律。当然，保密的重点、保密的手段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谁的信息灵通，就获得了发展的先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如果重要机密一旦失去，就等于把主动权让给了别人，就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我们编写方志，同样应讲保密纪律，把讲真实和讲保密结合起来，这也是讲政治的一个内容。因为志书的编写靠的是大量的真实的信息资料，而所需资料中，有些尚不能公开。特别是我们正在启动的第二轮方志主要内容是写现实的，现实生活中有好多事情还在保密之中，这就给我们编新方志带来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密的东西，如果你写进去，对大局，对国家没有好处。修志要求如实地反映历史发生过的

一些大事、要事，保密纪律又不允许你接触、了解以至公开其内容。这就是当代人编当代志的局限性。怎么办？只能写那些你有条件了解又可以公开的历史事件。客观条件允许记载的把它记载下来，修志的阶段性任务就完成了。时代的局限，人的思想上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不得干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不讲条件硬要去干，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对于目前难以如实记载的事，只能等待条件成熟时让后人去补修、续修。当然在第二轮修志过程中，我们应当对第一轮修志时的一些欠缺，特别是已经解密的事件，或者当时有些认识还不到位，现在认识清楚了的事件，或者有些事情收集资料比较粗糙，有重要遗漏，在第二轮方志中应该补进去。

总之，讲真实和讲政治是相辅相成的，要把它统一起来。讲真实是基础，讲政治是灵魂。没有真实做基础就谈不上先进政治。没有政治做指导，也难以求真务实。

作者为《北京志》主编
北京地方志学会会长